

《译林》在中国学术界留下的印记

周振鹤

清末一共出现过五种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,分别为《译书公会报》《译书彙编》《译林》《励学译编》与《游学译编》。《译林》的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,但在当时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。《译林》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,林纾与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,值得后人记念。

清末五种专门的译文杂志

晚清以来,国家屡受巨创,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一切有识有为之士,莫不上下求索救国之良方。其中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似成为一长期深入人心之良策,而且经过数十年的演变,所欲师诸夷之“长技”事实上已从技术层面延伸到制度及文化领域。师夷必先识夷,识夷之道尤以译事为先。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,翻译遂成为先进学人之要事。究其实,在识夷的道路上,最初影响中国与日本甚巨的《海国图志》与《瀛寰志略》二书亦均为编译性质的著作。以此为始,晚清七十年中,翻译或编译文字无数。起先专译西方文献,由地理而科技,由科技而人文。甲午战败之后,在西文翻译之外,更兼译日文。翻译成果既有专书出版,亦有大量连载于综合性质的新式杂志报纸之上。1899年,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一封信里说:“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”,揭示了时贤的共识。

潮流所至,清末更有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出现。这种专门的翻译刊物,一共出现过五种。依照发刊的先后,分别为《译书公会报》(1897)、《译书彙编》(1900)、《译林》(1901)、《励学译编》(1901),与《游学译编》(1902)。经过岁月的淘洗,这五种杂志存世量不多,所以自来之研究略嫌不足甚或有误。阿英在其《初期的翻译杂志》一文(载《小说四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)中对此已有论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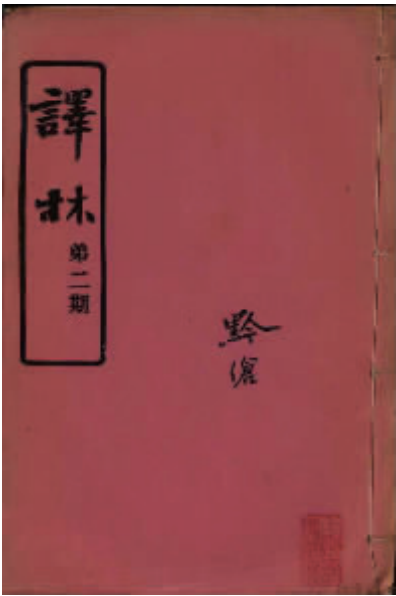
这五种杂志均创刊于戊戌维新前后,寿命也都很短。除《译书公会报》创办稍早外,后面四种几乎接踵而至,此亦见一时之风气。在创办

时间上位居中间的三种甚至并存过一段时间,所以互相间有提携之情。《译林》创刊号就登载代售《译书彙编》的信息,第二期《译林》发行时《励学译编》已经发刊,所以第二期广告就声明,该编行所有《译书彙编》与《励学译编》寄售,这个广告一直登到第十二期。因为上述这些专门的翻译杂志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性,所以早就有人注意搜集翻印。如《译书公会报》有中华书局影印本,《译书彙编》有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,《游学译编》有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。唯《译林》与《励学译编》迟迟未曾重印,这大约与原本的难觅有关,而即使已经重印者有的也不能得其全帙,尚待补齐。如台湾学生书局所影印《译书彙编》,不过只有第一、二、七、八这4期而已。阿英自藏则有24本,足见亦应重印行世。

近代去今不远,但近代文献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。当年撰写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·译林》条目者只看到十期,近来的研究者遍觅诸图书馆,所见略增,但往往亦看不到最后衍期出版的第十三期。好在《译林》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图书馆,加之该期刊与近代名人史事以至中日关系有密切关系,故上海书店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,以应学界作进一步研究的需要。

林纾、《译林》与林孝恂一家

阿英已经注意到,林纾的《〈译林〉叙》为《畏庐文集》所未收,可见林纾与《译林》的关系以及《译林》本身的详情长期为学者所不知。事实上,上世纪八十年代的《林纾研究资料》一书就只字不及《译林》杂志。前几年出版的



近代去今不远,但近代文献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。好在《译林》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图书馆。

《林纾年谱长编》则对于《译林》的创刊经过有所考述,但在参考文献中亦未列入《译林》,想来写作《长编》当时亦未得见《译林》原件。林纾本人不识外文,所以他在《译林》只担负所谓“监译”的责任,不过推测他应该也对学生的译文起了润饰作用。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他的学生们从事此项工作,因他本人一直对翻译工作极感兴趣,也已经以翻译《茶花女遗事》而得大名,有资望担任监译的重任。

《译林》社的形成颇有些故事性,其中有一点可以拈出,即从监译到译者群与支持者不少是旅居浙江的福建人。除监译是侯官林纾外,《译林》第一期刊登的“译员经理诸君姓名”中有侯官林纾,侯官林志昭,闽县林长民,“赞成诸君姓名”中有侯官林志恂。侯官与闽县是福州府的两个附郭县,实际上这些人都是福州同乡。再往前回溯,林纾之所以来杭州,是与林纾(即著名报人林白水)一同接受杭州知府林启的办学邀请,而林启也是侯官人。林纾到杭州后,协助举办三所新学堂,即养正书塾、东城讲舍与蚕学馆,并在东城讲舍讲学前后三年。与此

同时,林启与其属下兼同乡——海宁州知州林孝恂又请林纾与林纾在家塾中为他们的子弟讲学,这些子弟中有后来相当著名的林长民、肇民、尹民与觉民从兄弟四人(林长民为林孝恂之子,但为今人所熟知的身份则是林徽因之父)。

这个家塾分东西二斋,林纾课东斋,授古文辞赋;林纾主西斋,讲时务经世之学。这是在大变革洪流中官宦家庭的一种应对方式,希望子弟能够中西兼通,左右逢源。《译林》从第七期起由银洞桥移至万安桥小营巷口林氏家塾内,可见《译林》与林氏一家关系甚深。林长民为《译林》社的中坚,这从林纾《叙》提及《译林》社诸青年后生中,仅林长民一人具全名就可看出。林后来曾到早稻田大学留学,在段祺瑞政府里任过司法总长。

杭州日文学堂及其翻译活动

《译林》的译者既多为杭州日文学堂的学生,而《译林》的另一名监译伊藤贤道则是这个学堂堂长。伊藤是

日本帝国大学出身的文学士,为日本东本愿寺所派遣,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1月20日开设日文学堂于杭州忠清巷。该学堂的章程号称以学习日文为主,兼授欧文。课程有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,期限是三到四年。日文课除日语外还有算学、格致、伦理、经济、政法与哲学等科目。开学时,学生约有60名,头三个月里习日文者22人,英文16人(后因学生增加,伊藤为便利远路学生,于4月1日在上城保安桥开设类似性质的“东亚学堂”)。林长民即于开学当年的下半年入学于日文学堂。1900年四月,日文学堂校舍移至银洞桥(银洞桥),此处即后来《译林》的初期的编印所(第三期起改称编行所)所在。当年六月义和团事件起,学校关门,伊藤等人避地上海。十一月学堂再开,集合四散之学生,同时筹划创办《译林》杂志,并在《清议报》第69册上刊登林纾的《〈译林〉叙》以及六点《简明章程》。一个多月后,即壬寅年(1901)正月正式发刊(关于杭州日文学堂的成立过程可参考刘建云《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東文学堂》,载《岡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第10号(2000.11)》;感谢瀧野邦雄先生提供此材料)。

其实在义和团事件以前,伊藤已经向东本愿寺开教本部申请开设附属译书局,然因此项开支在预算外而未成。后来因有热心的学生支持,决定由学堂自力发行,译员则由学生担当。起初借用浙江按察使司衙门所藏木活字印刷,后因效果不佳,遂托商务印书馆代印(但第十三期已经不是商务代印,而是编译印书局印。或许因为脱期太久,商务已无法代印?)。由于主要译员林长民留学日本,《译林》于